



黄河落天走东海 万里写入胸怀间

——忆费孝通先生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 徐 平

跟费孝通读书结缘

第一次认识费孝通先生，是在1982年秋末冬初的时候，聆听他作“四上瑶山”的学术报告。那时我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在阴冷的地下教室，费先生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穿着深色夹袄，说着浓厚乡音的普通话，我在半懂不懂状态中听讲。他讲了自己在大瑶山调查的亲身经历，又谈到二上、三上大瑶山的感受，谈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最后是对我们这些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大学生的希望。刚开始是听不大懂他的话，渐渐听懂了话又觉得内容漫无边际，有些摸不着头脑，直到最后老先生几句简短的结语，一下子将他的整篇谈话串了起来，不仅浑然一体，而且生动自然，充满感情，让我立即感觉到这正是我要找的那种学问。

对费孝通先生的“私淑”之心一直没有放弃，我从报刊杂志上追踪着他的消息。1987年，我即将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毕业，有一天突然在报上发现一则很短的报道，说费孝通先生计划在有生之年培养一批博士，研究方向之一就是针对民族地区发展的“边区开发”专业。我激动不已，四处打听费孝通先生的住处，直接找上了家门。费先生的女儿费宗惠接待了我，让我去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潘乃谷联系。1987年7月的一天，潘老师专门致电告诉我被录取了，而且马上跟费先生去内蒙古作调查。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直接去西直门火车站与他们会合。顺路买了个最大的西瓜，算是拜师的见面礼。所有的人都到齐了，我是最后一名，刚一上火车火车就开动了，潘老师责问道：“怎么这么晚才来？”我说堵车，这是事实，心想真不该和卖瓜的小贩讨价还价。潘老师引我到费老面前，说：“这是您今年新招的学生。”费老放下正在看的书，打量着我，问我一些基本情况。没等他说几句话，我就抱出大西瓜拿出刀子切瓜，咔嚓一声打开后是一个生瓜，老先生满脸慈爱地看着我。我想他一定很后悔当初没有亲自检验一下，招了这么一个毛头小伙子。

从此我开始跟随先生攻读社会学“边区开发”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也是他培养的唯一“边区开发”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先生的言传身教

让我终身受益。我一直努力领会费孝通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文化学思想，也认真实践先生倡导的“从实求知”的学术精神。在我的书房里，悬挂着先生为我题写的“求实、创新、勤学、笃行”几个大字。每当我倦怠时，就感到先生慈爱的目光在看着我，耳边就响起先生的话：珍惜时光，踏实做人。或许，我一生也做不出什么值得引以自豪的成绩，但我会永远以先生为榜样，不断追赶。

在跟随费孝通从事民族研究的近30年历程中，对他的民族研究思想亦步亦趋，却总是陷于一城一地的局部领悟状态。蓦然回首，才发现费孝通从来不是孤立地研究民族问题，而仅只是在民族研究上着力最早且持续一生，他是从“民族”这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入手，或者说引以此为线索，不断推进对人类文化的认识，其终极目的是如何让社会更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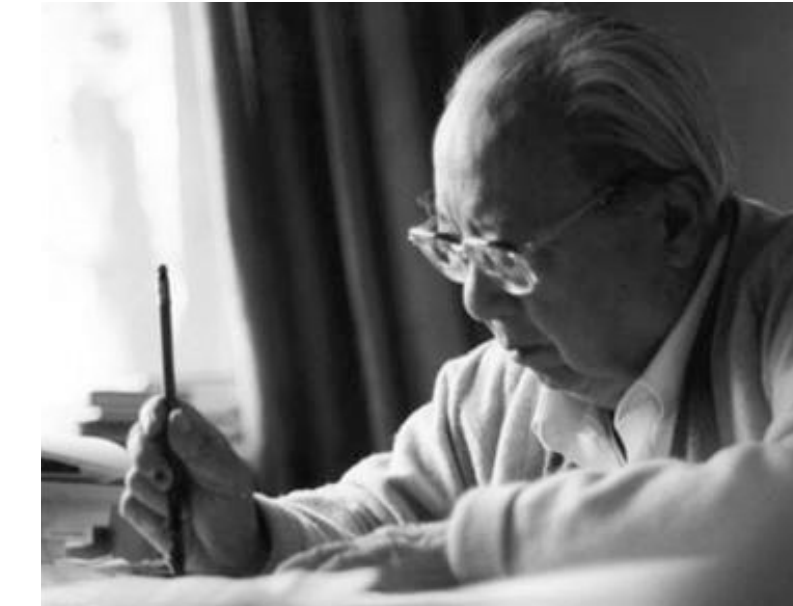
人生多经暴风雨

回顾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经历，可以概括为“从实求知看世界，三级两跳论中国，差序格局说乡土，多元一体求认同，志在富民是心愿，城乡边区重行行，文化自觉强九州，和而不同安天下”。

出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自称算是前清遗民，生长在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又幸运地师从吴文藻、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等国内外著名学者，饱喝洋墨水却一头扎进“乡土中国”，毕生“行行重行行”，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的路径，当过国家领导人却始终自认为“老来依然一书生”。在他的思想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所打下的深刻烙印，也有西方学术精华的熏陶，更能够看到一代大家的严谨风范和崇高的爱国情怀。“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既是费孝通一生学术追求的自我概括，也是费孝通学术思想的高度总结，他毕生都围绕中国现实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

费孝通的人生，正如他诗里写的一样“多经暴风雨”“荣辱任来去”。他经历过三次死亡考验，有过两次传奇的爱情经历，经历20年的压抑与沉默，坚持70年的学术生涯。有着如此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而又忧国忧民、笔耕不辍，他的人生值得阅读，他的思想保存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和智慧。

费孝通和他们那一代的许多优秀青年一样，满腔富民强国的情怀，大



学是从医学预科转到社会科学，试图从医治个人转变为医治整个社会。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后，发现听不到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即使听到了，也是听得越多，视听越乱，于是就有了他和前妻王同惠去广西大瑶山“蛮荒之地”的调查，付出了一死一伤的惨痛代价，费孝通也找到了他毕生的研究方法，那就是“从实求知”，其实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知行合一”理念的现代延伸，开始了他一生“行行重行行”“志在富民”的追求。

大瑶山调查，使费孝通从体质人类学者转变为社会人类学者，也认识到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不能随心所欲地凭感情“搭配”，必须在弄清楚中国社会的完整结构之后才知道应当改变什么，应当保留什么，“从认识中国社会到改造中国社会”。到姐姐费达生正在工业下乡实践的开弦弓村养伤，将费孝通与中国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虽然在大学时代他就短期参加过梁漱溟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活动，但这次调查使他的认识更加深刻。开弦弓调查使中国心插下的杨柳，产生了比《花篮瑶社会组织》影响大得多的《江村经济》，有意无意中使费孝通走到了世界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前列，被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评价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开拓了人类学本土调查和文明社会研究的新里程。《江村经济》以及在云南农村调查写作的《禄村农田》，直指当时中国农民的“饥饿”问题，提出了其根源是农村土地所有权，也看到了帝国主义入侵以及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农村凋敝，描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农村惨淡景象，揭示出中国革命的内在原因。在云南三村的调查基础上，费孝通在上世纪40年代先后发表了《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初访美国》《美国人的性格》《重访英伦》《内地的农村》等一系列作品，提出了“差序格局”等中国社会研究的核心概

念，开展国际视野下的文化比较，在对中国传统的皇权、绅权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对传统农业社会文化转型进行深入探讨。

1957年的二访开弦弓村，费孝通敏锐地发现解放后虽然粮食大幅度增产，但农民反而吃不饱饭的怪现象，经过细致的社会调查，认为问题出在片面地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上，破坏了传统的农工互补的经济结构，工副业的萎缩直接导致农民的贫困，他开始在报刊上为恢复乡村工副业生产而鼓与呼，可惜在《新观察》杂志上的连载文章尚未发完，费孝通就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始他沉寂20年的艰难岁月。即使是在干校的艰苦环境中，费孝通与当地农民也结成亲密的朋友关系，甚至以60岁高龄还下大田学种棉花。这段生活经历，也使他对社会与人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从旁观者变成了亲历者，萌发了社会人类学关于心态研究的思考。

1981年费孝通三访开弦弓村，当地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300块，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副业发展起来后，老百姓有钱了，多种经营又焕发了农村的活力，看到自己当初提出的“农工相辅”得到了应验，他非常高兴。以后又将开弦弓作为标本，追踪调查26次，而且从村到镇，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从镇到全国一盘棋，将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看作做活中国人口这盘棋的“两个眼”，沿着城乡和边区两个路径，不断进行类型加比较的调查研究。他及时总结各地发展经验，总结出“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等多种发展类型，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出主意，想办法”。费孝通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总结各地农村发展经验，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他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富民，思考最多的是中国发展的现实道路。

富裕之后怎么办

乡镇企业大发展，大大推进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乡镇企业出现转制转型，形成了私营个体经济大发展和多种所有制共同繁荣。费孝通又将思路上升到区域合作发展的新模式上，他在1987年提出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设想，主要是甘肃的临夏和青海的海东两个地方跨地区合作。90年代初他向中央建议搞长三角开发区，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发展。费孝通在珠江模式追踪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珠三角模式和南岭协作区的整体扩大，与东南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一倡议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又几乎同时提出黄河三角洲开发，在天津几次强调港口与腹地的关系，对沿海湾开发和港口建设专门向中央提建议。

他不仅重视内地农村的发展问题，也一直关注边疆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改革开放后他又四上广西金秀大瑶山，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民族经济，民族区域自治不是“画地为牢”，必须大力宣传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首先是经济上的共同发展。他最早提出边区开发的构想，主张“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为新世纪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鸣锣开道。根据在内蒙古等地的调查，他提出了要防止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两个失调”，较早提出了人和自然相和谐的问题，从包头钢铁厂“既要包钢也要包人”，提出打破“围墙经济”以及推动国企改革思路。从郭风温、赫哲等少数民族的发展困境，提出发挥各少数民族传统产业优势，促进当地整体发展，重点关注和推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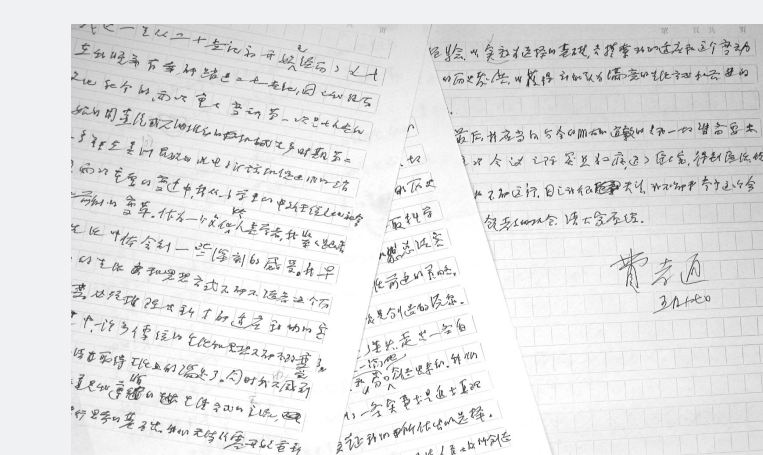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后现代主义反思成为国际性的学术议题，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平静。人类怎样面对

“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建立一个和谐的地球家园成为费孝通深思的大问题。他在1990年80岁生日时，提出了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愿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更引起他深刻的关注，结合一生的民族地区调查研究经历和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教研积累，他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 and 知识，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认同基础，有力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仅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并在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成为定义中国民族关系和走向的核心概念。

费孝通把中国近百年来文化转型比喻为“三级两跳”，即伴随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初步的工业社会，当工业社会尚未完全形成又很快进入了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后工业化时代，经历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一跳，接着又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一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容易带来社会失衡和文化眩晕，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就提出“富裕之后怎么办”，又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转型问题，引发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问题，敏锐指出在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如何通过“文化的自觉”，掌握文化转型的主动权，重建民族文化自信心，巩固国家和民族认同，建立“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可以说，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始终贯穿着他所倡导的“从实求知”精神和“志在富民”的抱负。就在前一段时间，为纪念费孝通江村调查80年，我再次到吴江拜谒了先生的墓园，重新品味用他自己的话题写的墓碑：“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正因为费孝通很好地解决了理论和实际、学术和应用、高深和普及的关系，他的学问对国家有贡献、对人民有关怀，对社会有用处、对学术有意义，成为名符其实的一代学术大师，更为后人树立了为学为人的榜样。

学术人物



▲ 费孝通先生手稿，写于2000年

行行重行行

□ 王彩平

费孝通先生去世之后，钱伟长在“悼孝通兄”中写到，孝通兄早年负笈英国，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以“江村经济”研究一鸣惊人，享誉海内外。回国后更是以强国富民为己任，行行重行行，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身影出现在大城小镇。

“行行重行行”，本是《古诗十九首》中一首诗的名字，用来形容费孝通的一生，却是十分恰切。事实上，费孝通自己在80岁以后也曾这样说到，一年好比一元钱，我还剩几元钱了，要用得得当。就是志在富民，下去跑跑，叫行行重行行。他1981年“重理旧业”后到1991年十年间在社会学领域研究成果的精选本，题目就叫《行行重行行》，这本书，被学界认为是费孝通晚年具有里程碑式的著作。可见，“行行重行行”，也是被费孝通自己所认可和推崇的。

“行行重行行”，实为一种治学手段、研究方法。所谓方法，是人们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采取的具体手段。在中国古代语境中，方法属于“术”的层面，与“道”相对，如果说“道”主要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术”主要解决的则是“怎么办”的问题。大教育家蔡元培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方法的重要性：科学知识是点点的金，最终有限；科学方法则是点石成金的手指，可以产生无穷的金。毛泽东也曾用桥和船过河的例子强调工作方法在办事中的重要性，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行行重行行”的核心要义与人们耳熟能详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理论联系实际”“没有调查权就没有发言权”相一致，重要性不言而喻。事实上，人类文明的进程本身，就是一个“行行重行行”的过程，大禹在随父治水中悟到了“宜疏不宜堵”的治洪原理；孔子通过周游列国治国安邦来印证所学；亚里士多德在考察了150个城邦的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写成了他的传世之作《政治学》；李时珍、徐霞客、马可·波罗、哥伦布等都是靠“行行重行行”取得重大发现，写出宏伟巨著。

但是，“行行重行行”，从“方法”发展为一种“方法论”，即“田野调查法”，成为指导当今人类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和哲学基础，却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发展时期。在古代中国哲学和古希腊罗马哲学中，还没有专门的、自觉的方法论学科分支。近代大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探索正确认识自然的科学方法论的迫切需要，因此，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论》中，提出了新的认识方法即经验归纳法，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提倡实证主义，将培根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引入了社会学领域，认为这是一门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探索人类社会现象的学科。这里孔德所谓的“现代科学方法”，就是后来胡适

等人传入中国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孔德之后，“实证主义”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论。

上世纪20年代，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根据自己“行行重行行”的经验，在人类学领域创立了一套新的田野调查方法论，即“参与观察法”，它要求田野工作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保持适度的文化距离），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从而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描述和记录。由于田野调查法始于马林诺夫斯基，又被称为“马林诺夫斯基革命”，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人类学有了方法论上的自觉，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必须到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住上一年半载，并实地参与到该部落的生活中去，完成一份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纪录。

而“田野调查法”在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和普及，费孝通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他88岁高龄之际，费孝通决定开始践行20年前提出的“反思补课”想法，将芝加哥学派创始人派克的代表作《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作为补课的入口门径，着手并坚持撰写了22节（含后记）的《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以下简称《补课》）。《补课》一文中，费孝通写到，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

他在课堂上第一句话是“在这门课程里我不是来教你们怎么念书，而是要教你们怎样写书”。接下去，他说我们应当从生活的具体事实中去取得我们对社会的知识。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联系实际。

对此，费孝通回忆说，早在五四运动时，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已由胡适等人传入了中国，但我们从派克老师口中听到时还是十分激动，说明这套话并没有进入我们的头脑里，被读死书、死读书的传统卡住了。派克老师把这个障碍给踢开了，把我们的脑门打开了，老话变新活话了，这一变就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在派克老师的启蒙之下，费孝通此后的人生，就与社会调查密不可分——那次痛失爱妻王同惠的误入陷阱事件，就发生在他们前往广西瑶寨作实地调查的翻山越岭中，而奠定他在人类学领域地位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则得益于他在开弦弓村养伤期间拄着双拐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在大街小巷串门访户所得来的详实的田野调查结果。

机缘巧合的是，在英国攻读博士期间，费孝通又有缘师从创立了“田野调查法”的马林诺夫斯基，当他打算以“花篮瑶社会组织”作底子编写论文时，马林诺夫斯基敏锐地捕捉到了“江村经济”的学术价值，于

是，《江村经济》得以出炉，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并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博士毕业归国后，费孝通继续他的“行行重行行”之路，即使年逾八旬，费孝通也努力克服年老所带来的体力和行动上的困难，经常亲赴调查现场。

不过，正所谓：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开展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掌握科学的方法很重要，但掌握正确的理念更为重要。“道”与“术”的关系，应该是“以道统术，以术得道”，也就是说，一方面，像达尔文所指出的，“方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另一方面，“道”对“术”应该起着统领作用，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

在《补课》中，费孝通这样评价派克，这位老师最不高兴的是学生脑中没有经常在想需要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脑中没有问题强迫着自己，怎能使一个人的思想不断前进和推陈出新呢？派克所强调的正是“问题意识”，就是指调研者不是带着空洞的头脑，不是带着理论的成见，而是围绕自己内心的疑问与困惑，围绕自己敏感察觉到的问题，来进行田野调查。“问题意识”，正是费孝通进行学术研究的根本之“道”，终其一生，正是一个带着对乡土中国的深切关怀，带着“问题意识”，不断“行行重行行”的过程。

学术评论